

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

——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

周延云 同秀荣 ◎著

KARL HEINRICH MAR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

——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

周延云 闫秀荣 ◎著

KARL HEINRICH MARX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周延云，闫秀荣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2

ISBN 978 - 7 - 5161 - 9541 - 3

I. ①数… II. ①周… ②闫… III. ①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研究 IV. ①A81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809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特约编辑 林木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97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安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马克思主义理论
专项科研项目（SKZX14004）研究成果

前　言

当今，数字信息技术正在悄然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就在人们为信息通信技术（ICT）带给人类的福祉高唱赞歌之际，欧美学界却有一批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以数字化时代人类新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为切入点，高高举起了批判跨国信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大旗，剖析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跨国ICT资本不仅剥削雇佣劳动而且剥削非雇佣的无偿劳动的生产方式。其直接原因在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引发了这些学者再度反思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所固有的缺陷。

本书以国外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生产方式理论）分析数字化时代的霸权劳动形式“数字劳动”的成果为对象，并对其进行历史维度的梳理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再审视，力求客观、科学地展示国外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研究的历史脉络和研究成果。

国外学界最早关注“数字劳动”的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著名学者蒂兹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之后，相继召开了主题为“数字劳动者：工人、作者、公民”（2009年10月）、“数字劳动：既是游乐场又是工厂的互联网”（2009年11月）和“数字劳动：血汗工厂、罢工纠察线、路障”（2014年11月）三次学术会议。2013年，英国开源学术期刊《传播、资本主义和批判》（以下简称3C）发出征集主题为“全世界哲学家团结起来，理论化数字劳动和虚拟工作”的征文通知，一年后，3C第12期发表了同名主题的论文集（2014年12月）。除特拉诺瓦在题为《免费劳动：数字经济的生产文化》（2000）一文中通过互联网“免费劳动”对“数字劳动”做了初步定义之外，国外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上述几次会议产生的学术论文和2014年3C第12期特刊上所载的论文。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劳动概念和表现形式。

首先，对数字劳动范畴的界定。特拉诺瓦借用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非物质劳动”概念研究了互联网上的“免费劳动”，并通过界定“数字经济”中互联网用户的“免费劳动”对“数字劳动”进行了初步的定义。“免费劳动”作为一种文化的知识性消费转化成为生产性行为，其生产的互联网用户信息被作为商品售卖和剥削。“免费劳动”是自愿给予和“零报酬”并存，享受和剥削同在，具体包括互联网用户自由浏览网页、自由聊天、回复评论、写博客、建网站、改造软件包、阅读和参与邮件列表、建构虚拟空间等。乔纳森·波斯顿（Jonathan Burston）、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和艾莉森·霍恩（Alison Hearn）认为，“数字劳动”是一个模糊了劳动和生活、工作和玩界限的范畴，它用于分析数字媒体用户日常生活中诸多不同的方面，因此也是一种模糊了“工人、作者和公民”不同社会角色界限的劳动。特雷博·肖尔茨（Trebor Scholz）提出，数字劳动为既是游乐场又是工厂的互联网上的劳动，除传统的工资劳动外还有无规律的自由免费劳动，是个体消耗在社交网络上的创造性工作。与传统的物质劳动不同，它们全然感觉不到、看不到和闻不到。互联网上的“玩”和“劳动”紧密相连，从而产生了“玩劳动”（playbour）术语。

其次，关于数字劳动的表现形式问题。阿比盖尔·德克斯尼克（Abigail De Kosnik）认为，粉丝们的活动是数字劳动的具体表现；大卫·赫斯蒙德霍夫（David Hesmondhalgh）研究了互联网用户生成内容的“免费劳动”；杰克·布拉提赤（Jack Bratich）分析了“自己动手做”工艺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复兴；恩达·布罗菲（Enda Brophy）研究了传播资本主义呼叫中心的服务性劳动；梅勒尼·米尔斯（Melanie Mills）和保罗·琼斯（Paul Jones）研究了高校图书馆员和学者的数字化工作；巴里·金（Barry King）认为，“创造性劳动”是数字劳动的“最新表现形式”。3C 把数字劳动形式概括为互联网行业的专业工人的劳动、无酬劳动、受众劳动和玩劳动。

第二，与“数字劳动”相关的维度。

首先，学者们考察了“数字劳动”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丹·席勒（Dan Schiller）等学者揭

示了。“数字劳动”所处的社会背景为“信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互联网资本主义”“传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等。

其次，“数字劳动（者）”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问题。塞缪尔·特罗索（Samuel Trosow）研究了加拿大知识和创造性劳动者协会所采取的版权政策问题。阿吉特·普亚提（Ajit Pyati）认为，关于印度知识社会讨论的新自由主义腔调必定反对批判性的公共数字化理念。

最后，数字化时代的劳动特征及价值来源。文森特·曼兹罗（Vincent Manzerolle）提出，移动上网使人类的交往变为工作，并卷入信息资本的积累之中。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

首先，学者们分析了马克思理论对于研究“数字劳动”的必要性。爱马努埃莱·莱奥纳尔迪（Emanuele Leonardi）认为，如果分析后福特主义的形成以及当今资本主义新的剥削模式，就必须运用马克思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理论；杰里米·阿罗斯（Jeremy Aroles）认为，马克思理论对于数字化工作场所的研究具有重要性，并考察了数字化无量经济中产生的就业、剥削和异化的新形式；穆罕默德·卡泽朗（Mohammad Kazeroun）认为，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运用于协作性的计算机中介传播时代；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认为，马克思建构了最具影响力的劳动理论，他是把工作的历史性特征描述为一个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观点的第一人。因此，福克斯选择马克思的理论作为研究数字劳动的理论基础。

其次，关于数字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问题。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和福克斯认为，数字劳动过程是一种价值增值在加剧的过程，数字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其积累。他还认为，网络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立。谷歌展示了一个激发、发挥人们合作潜力和创造力的平台，但同时存在对用户隐私的监控及用户劳动的剥削问题。他还把马克思的阶级和资本积累概念运用于社交网站环境的研究，并倡导用一种“共产主义的互联网”替代当今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再次，运用异化、剥削和阶级范畴研究数字劳动。马克·阿德杰维克（Mark Andrejevic）运用“异化”和“剥削”两个概念分析了社交网站用户的免费数字劳动。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在他的

“黑客宣言的思考”一文中断言，互联网时代的“资产阶级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走正道的“黑客阶级”——躲在五一节红色横幅后面窃取劳动者成果的不劳而获的阶级。福克斯研究了脸谱、谷歌等世界著名社交媒体的剥削模式。另外，还有关于意识形态及其批判问题。福克斯批判了传播资本主义的 Web 2.0 是一种“参与式互联网”的“民主化数字技术”的意识形态。纳卡穆拉（Nakamura）认为，在线游戏中阶级和种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号召全世界数字劳动者团结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抵制数字资本的剥削。利斯·拉鲁（Lise Lareau）提出，数字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媒体行业，但是，关于新闻记者如何赢得裁员、降低薪水以及数字化引起的工作重压的战斗，他的回答是集体行动。马克·布雷德利（Mark Bradley）等的回答是“联盟”。

综上所述，国外“数字劳动”研究成果对数字劳动的定义、特征、形式、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等方面都做了细致的研究。从最初的“数字劳动者”会议就表现出运用马克思的范畴和理论研究数字劳动的取向，《数字劳动：既是游乐场又是工厂的互联网》（同名会议论文集于 2013 年出版）一书所载的 14 篇文章，其中 8 篇提及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的理论。这都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理论对于数字劳动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尽管上述研究明确了数字劳动已经成为当今数字化时代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而且涉足了马克思的诸多理论，然而，从理论的系统完整性和深刻性来看，福克斯在其《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2014，英文平装）一书中做出了骄人的贡献。

与国外本领域的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相对迟滞并处于初创阶段。从所能搜集到的相关研究成果看，没有发现直接以“数字劳动”为选题的学术研究文献，而与“数字劳动”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传媒学者、社会学学者的论文中提及福克斯的“数字劳工”内涵（邱林川的《告别 i 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i 奴含义：去社会化的生存方式），并从此视角对“大数据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解读（石义彬和吴鼎铭，2014 年 12 月）。曹晋、张楠华（2012）《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为例》一文研究了一种具体的“数字劳动”形式：字幕工作组的兴趣劳动。此外，陈婉琳和黄炎宁的《信息资本主义及互联网的劳工》（2014 年 5 月）是目前

国内学界唯一一项翻译福克斯文献的作品。其核心观点为，信息资本主义的崛起要求把阶级概念拓展到创造和再创造（互联网）公共空间经验的每个人，例如，互联网上通过自己的实践而生成内容的用户。他们的空间和经验被资本挪用、剥削，并为资本积累效劳。梁萌在其《互联网领域中的知识工人》（2014年3月）一文中提出，“互联网劳动者”仅指互联网公司内部的劳动者，而不包括网民用户。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数字劳动”的主体“数字劳工”的内涵、特征以及其“数字劳动”产品商品化从而被数字资本所剥削的现状。至于更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诸如“数字劳工”所从事的数字劳动如何界定，涵盖哪些范围，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研究“数字劳工”的剥削性质等，目前仍鲜有涉足。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的研究，尤其是福克斯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批判理论的研究不仅填补了数字劳动的研究空白，而且对当今中国学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综览国外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研究，从最初的仅采用马克思的个别范畴、概念或理论对数字劳动个案进行分析，到福克斯创建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批判理论，我们沿着数字劳动研究的历史轨迹前行，旨在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研究的阶段性和最高理论成果；并试图在国内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社会学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领域，开辟以“劳动”为核心的新视角。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的劳动理论、生产方式理论、阶级构成理论、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依然具有重大的价值。同时，本书为中国学者重建社交媒体时代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给予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指导。

从应用价值层面思考，首先，本书试图通过揭露资本逻辑掌控下的数字社交媒体所追逐的“免费劳动”的获利模式，对于我国数字媒介领域的生产和监管具有指导意义。其次，警示与防范资本通过互联网建构的“网络社会”对人们的社会化生存造成异化。最后，对互联网用户如何在被称为“社会工场”的网络中自觉摆脱数字资本的控制、发挥个体自由全面的创造性潜能提供可能的路径启示。

本书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贡献：

第一，在国内学界首次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研究的历史轨迹和现状，尤其是福克斯的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批判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试图弥补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不足。

第二，通过挖掘国外学者数字劳动理论的研究精华，丰富数字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内容并提升其理论价值，以强化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

第三，本书穿越数字劳动研究历史，尤其以福克斯理论研究为主线，旨在发现其理论所描述的数字劳动时代的隐性剥削、全球性奴役等现实问题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以期为我国马克思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四，本书所采用的多学科概念、范畴和理论的研究方法，可以启发国内学界更多地关注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传播学，以拓宽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研究内容，弥补国内学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经济学研究不足。

第一章 绪论

当我们静下心来环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空间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苹果手机、一个 iPad、一台笔记本电脑或一部台式计算机充斥着我们的周围。现在的我们，如果每天不上微信、不刷朋友圈，似乎这一天就是白过了。坐电梯或公交车的时候，我们竟然会看到爷爷奶奶带着手里捧着 iPad 的两三岁的小孙子……可见，在如今的信息时代，ICT（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已经无孔不入地嵌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使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由此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这个最初由美国学者尼葛洛庞蒂在 1996 年提出的新概念用于描述当今 ICT 技术对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影响也许极为贴切。我们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生活和工作，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应用数字技术（或者说信息技术）从事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活动。那么，当手机和电脑带给我们生活、工作诸多便利和快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或想到这些 ICT 产品背后隐藏着的其他鲜为人知的东西呢？

第一节 ICT 劳工的工作状况

在中国，提及“富士康”和“苹果”无人不知。富士康公司“超泰勒式”^① 的财富增长模式致使其不断出现“连跳”事件，从而引发国

^① 刘娅：《富士康员工自戕事件的多维致因——“超泰勒式”财富增长布局和叠加效应下的消极抗争》，载李凡《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2011）》，世界与中国研究所，2011 年，第 233—262 页。

内外各界对富士康劳工工作与生存状况的高度关注。自 2007 年以来，苹果公司以技术创新和时尚设计的理念相继推出了一系列 iPhone、iPad 等 IT 产品，进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世界销售市场的狂潮。然而，2011 年 10—12 月香港《电子通讯》刊载了一篇题为“What's Apple?”的文章，并把 iPhone 称为“血手机”。原因在于其组件来自刚果（金）等非洲一些地区的“冲突矿产”。为了采掘这些“冲突矿产”，不仅当地的自然环境受到极大的破坏，而且还产生了诸多的人权问题，例如，虐待、童工、强奸……在时尚漂亮的苹果产品背后却隐藏着如此肮脏的一面——污染、侵犯和毒害。而这一面却深深隐藏在其不为人所知的供应链之中。^①

刚果民主共和国北基伍省有一个名叫 Muhanga Kawaya 的矿工，他是一位采掘生产电脑顶部和移动电话所需矿物质的矿工。他对于自己的劳动情境做了这样的描述：“当你通过极小的洞穴爬行的时候，你没有足够的空间站起来用尽全身力量挖掘矿藏。你只能用自己的手臂支撑、手指当工具并跪着进行采掘，以至于全身被严重擦伤。可当你手捧锡石、拖着受伤的身体从洞口爬出来的时候，等待着你的是冷冰冰的枪口。持枪的士兵用枪口威胁着你把锡石交出来。但是，如果锡石被抢走我们就意味着没有钱去购买食物。所以，我们总是在挨饿。”^② 深圳富士康的中国工程师们说：“我们没有星期天，忙了整整六个月，我们生产了第一代 iPad。周末也没有加班费，每天 12 个小时的工作致使我们筋疲力尽。”^③ 在硅谷，一位柬埔寨的 ICT 装配工披露了有毒物质的传闻，“我和我的同事们有同感，可担心失去这份工作而从未说出此事”。^④ 谷歌的一位软件工程师这样描述了自己的工作状况，“因为有很多好处（如免费的食物），雇员们希望工作更长的时间。这似乎成了一个无言的规矩。许多人一天工作超过 8 小时，而后会在家里发电子邮件或再工作几个小时，晚上（或在周末）也是如此，把工作和生活平衡

^① 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文环境研究所：《苹果的另一面》，《IT 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苹果特刊》2011 年第 4 期。

^②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1.

^③ Ibid. .

^④ Pellow and Park, *The Silicon Valley of Dreams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mmigrant Workers, and the High - Tech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9.

好像是很难的。我想给高管们一些建议：给工程师们更多的自由，让他们在没有 120% 的工作压力下用 20% 的时间作出一个很酷的项目”。^① 2013 年 2 月，德国公共服务广播公司 ARD 播出了一部纪录片，名叫《可怜！亚马逊的合同工们！》。调查记者 Diana Löbl 和 Peter Onneken 用资料证明，德国亚马逊雇用了来自波兰、罗马、西班牙、匈牙利和其他国家 5000 多名移民充当仓库合同工。调查表明，这些工人的工资极低，六七个素不相识的工人一组，住在一个小屋里，两个人共用一个很小的卧室。他们被临时机构雇用，因此也只有临时合同。尽管很多工人不会说德语，但合同却是用德语签的。每天，这些仓库工人们要跑 17 千米，这对他们的脚和皮肤特别不利。在他们来德国之前，工人们没有看到也没有签订合同，而后常常发现自己挣的钱比当初许诺的要少很多。还有，美国著名社交网站脸谱要求用户在没有付费的情况下将其网站翻译成其他语言。其翻译是众包给用户的。Valentin Macias，一个在韩国首尔教英语的加利福尼亚的年轻人，他曾经自愿为非营利性机构维基百科做过翻译。但他不愿为脸谱当翻译。原因在于，维基百科是一个无私的慈善捐助的信息共享网络平台，而脸谱却是营利性的。他说，人们不应该受欺骗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到一个数百万美元的公司……^②

我们对上述各种不同的劳动案例运用马克思辩证法的扬弃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发现，所有上述案例都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类的劳动力被剥削，即以 ICT 企业获取利润、工人身心备受摧残的方式来剥削劳动力。

第二节 全世界哲学家团结起来，关注 数码劳工和理论化数字劳动

1845 年春天，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通过对

^①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2.

^② Ibid. , pp. 2 – 3.

从前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批判，首次对实践进行了科学的理解，从而奠定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第十一条明确了实践的终极目的是“改变世界”。在全球互联网时代，如何把我们的世界改变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一个公正、和平与和谐发展的新世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英国开源电子期刊《传播、资本主义和批判》（*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简称 3C）编辑、传播学政治经济批判学派（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杰出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题为《全世界哲学家团结起来，理论化数字劳动和虚拟工作：定义、维度和形式》^① 的特刊中谈到，对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和数码劳工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但是，与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相比，理论研究却滞后于技术的发展以及因技术发展所导致的诸多现实问题。今天，哲学家们首先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和劳动过程中遭受深重剥削的数码劳工们。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数字劳动和虚拟工作已经达成共识。然而数字、社交、移动媒体对劳动和工作世界带来的变化远不只仅仅在理论上阐释世界。为了更好地改变信息社会，我们首先要运用批判理论来解释数字劳动；世界不同领域、背景、跨学科、交叉学科和各学科的社会理论家们必须团结起来，为这个集体的哲学任务而奋斗。

一 资本主义卓越的分析大师马克思：马克思曾经的遮蔽与今日的出场

坎特布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Rowan Williams）提出了一个关于马克思的得体评价，“在很久以前，马克思发现了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神话，它本身代言着一种无生命力的现实、权力和组织机构”。我们可以看到，乃至教皇都在赞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卓越的分析能力”。^②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西方学界乃至主流媒体对马克思理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关注，马克思主义再领时代风骚。学者们不仅对马

^① Marisol Sandoval and Christian Fuchs, “Introduction: Philosoph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orising Digital Labour and Virtual Work—Definitions, Dimensions, and Forms”, *Triple C*, Vol. 12, No. 2, 2014, p. 464.

^② Roger Boyes, “Banking Crisis Gives Added Capital to Karl Marx’s Writings”, *The Times*, October 20, 2008.

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热切的研究，同时也开启了对其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在今日 ICT 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对当今社会和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给予了高度关注与研究。

（一）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趣变化的实证研究：从下降到上升

1977 年，传播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创始人达拉斯·史麦兹（Dallas Smythe）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传播的作用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30 多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导致了人们的兴趣转向，即从社会阶级、资本主义向全球化、后现代、共产主义的失败乃至历史的终结的转向。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似乎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的盲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被边缘化，乃至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成为一种高风险的职业。但是，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理论，从其经济危机理论到以马克思主义范式研究传播学乃至 ICT 技术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影响都进行了研究。马克思回来了，是他的思想回来了。其实，也许他从未离开过我们。^① 马克思的复归并非仅仅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激发了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预示的诸多问题在 ICT 发展的今天成为现实，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帝国主义理论、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② 西方学者运用资本主义分析大师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数字劳动被资本剥削的经济事实成为国外学界的一个持续性的热点论题。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社会科学文献索引中以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为关键词的文章数量非常之多，其研究划分为 1968—1977 年、1978—1987 年、1988—1997 年、1998—2007 年和 2008—2012 年五个十年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马克思主义兴趣的下降在 2008 年之后有一个新的变化趋势。^③

^① Christian Fuchs, “Marx is Back – The Importance of Marxist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Critical Studies Today”,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Vol. 10, No. 2, 2012, pp. 127 – 140.

^② Christian Fuchs and Nick Dyer – Witheyford, “Karl Marx @ Internet Studies”, *New Media and Society*, Vol. 11, 2012, pp. 1 – 15.

^③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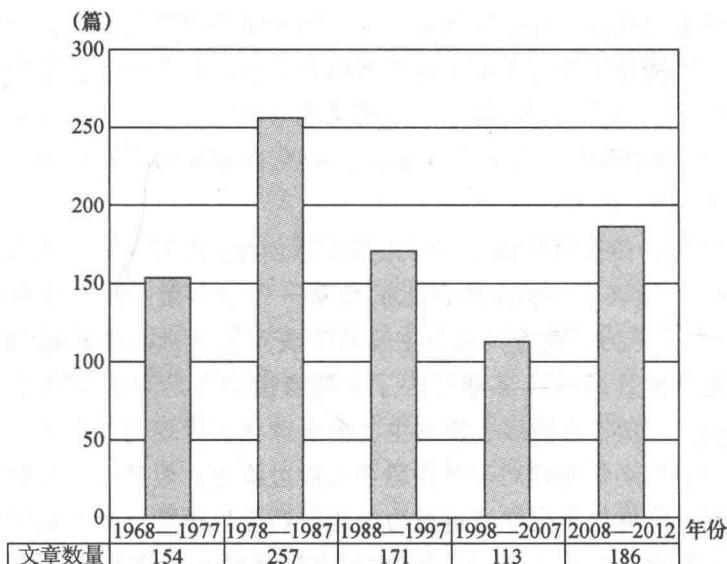


图 1-1 社会科学文献索引中所列举的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十年期出版文章数量的年均数（2013 年 1 月 22 日检索）

资料来源：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11。

从图 1-1 中可以看到，在 2008—2012 年的 5 年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年平均数（186 篇）与 1998—2007 年（每年 113 篇）、1988—1997 年（每年 171 篇）相比数量有所增加。

2012 年 5 月 2—4 日，“第四届信息通信技术与社会”大会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反思批判、批判理论和哲学在信息社会中的作用，以及批判理论与互联网、社交媒体之间的关系”。这个以数字媒体和信息研究为兴趣的专家团队所倡导的年会，在最大规模的第四届会议上产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诸多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媒体与互联网研究作品的诞生——学者们对马克思理论研究兴趣的复苏。^① 2012 年第 10 卷第 2 期的 3C 期刊，全面介绍了题为“马克思回来了——马克思理论和研究对当今传播学批判研究的重要性”的学术成果。作为本刊编辑以及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学教授的克里斯蒂

^① Christian Fuchs, “Critique, Democracy and Philosophy in 21st Century Information Society: Towards Critical Theories of Social Media”, *Triple C*, Vol. 34, No. 3/4, 2012, pp. 89–99.

安·福克斯对所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多维分类阐述，并列举了西方学界流行的十大反对马克思的偏见在传媒领域中的表现，并对此进行了强有力地反驳。他断言：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到来了。^①

（二）自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2011 年 8 月 28 日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给卡尔·马克思一个拯救世界经济的机会》的文章，文章说：作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努力研究金融恐慌、游行示威及其他折磨世人的社会疾病时，应该好好地学习一个很久以前就已经逝去的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的作品。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很快地认识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伴随资本主义一生的危机，进而就会想方设法用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以逃离危机陷阱。2009 年 2 月 2 日的《时代周刊》欧洲版封面刊载了一个马克思对危机的询问，“面对危机，马克思会思考什么？”在封面故事里，马克思是以资本主义的救世主而出场的。当我们思考如何拯救资本主义的方案时，对制度的深度批判是有意义的。^②

不断增长的收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分配的巨大差距、普遍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和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所有这些使新自由主义已经不再是人们公认的常识。伴随着阶级冲突层级的上升，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得到全球的目睹和认可。伊格尔顿指出，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像马克思那样被曲解；他论证了马克思作品的核心思想与西方学界公认的十大偏见是相反的。^③ 自 2008 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开始，对马克思作品进行研究的极为高涨的学术兴趣已经生根。^④

齐泽克（Slavoj Zizek）认为，生态危机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对抗（不和谐）、知识产权、生物遗传学、新形式的种族隔离和贫民窟表明，我们一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同时，产生了一个恢复马克思主义并为他曾经的消失进行辩护的强烈愿望。^⑤ 他认为，2008 年的世

^① Christian Fuchs, “Marx is Back—The Important of Marxist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Critical Studies Today”,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Vol. 10, No. 2, 2012, pp. 127 – 140.

^② Ibid. .

^③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 2011 年版。

^④ Christian Fuchs, “Marx is Back—The Important of Marxist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Critical Studies Today”,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Vol. 10, No. 2, 2012, pp. 127 – 140.

^⑤ Slavoj Zizek,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Verso, 2008.